

沙勿略早期日本開教活動考述

劉小珊*

耶穌會創始人之一聖方濟各·沙勿略，1549年登上日本鹿兒島，掀開日本天主教傳教歷史上輝煌的第一頁。步沙勿略後塵，相繼進入日本的傳教士在豐後、平戶、博多、九州等地發展教會勢力，為日本的天主教傳教事業嘔心瀝血，留英名於日本天主教的傳教史冊上。一直以來，研究者很少關注沙勿略在日本開教時期其周圍的人和事，而沙勿略的卓越成就實離不開他身邊眾多擁護者的支持，沒有他們的大力協助，沙勿略也不可能那麼顯赫的成就。2006年是沙勿略誕辰500週年紀念，再次展示出那個立體的、厚重的天主教日本早期開教的歷史畫面，十分有意義。

1549年聖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耶穌會創始人之一)登上鹿兒島，被認為是天主教進入日本的最早期，距離乘坐中國人帆船的葡萄牙人漂至九州南端的種子島七個年頭。1547年，犯殺人罪逃亡國外的日本人彌次郎在葡萄牙商人的勸說下與沙勿略會面，遵其勸說，赴果阿神學院開始學習，由此，薩摩出身的青年保祿·彌次郎成為最早接受天主教洗禮的日本人。沙勿略日本開教以來，很多優秀的耶穌會士步其後塵，陸續來到日本傳教。其中具有政治才能的人也不少，他們的努力使得傳教事業很快進入隆盛期，即使在禁教迫害期間也收到不小的成果，特別是在天主教傳教的文化活動方面。

有關沙勿略的研究，從16世紀以來沙勿略傳記和研究專論紛紛出版，直至本世紀，據葡萄牙編撰《耶穌會史關係書志——人物篇Ⅲ》(1990)記載，從1901-1980年，研究沙勿略的成果竟達到1,851件之多。在眾多的研究中，引起筆者特別關注的國外研究有德國人格奧爾克·舒馬赫爾(Georg Schurhammer)神父和日本學者岸野久二人的研究。在有關研究之質量和數量上均令人矚目的人物當首推耶穌會士格奧爾克·希爾罕馬神父(1882-

1971)。舒馬赫爾神父青年時代渡海到達印度，一度健康極度不佳，曾向沙勿略之靈祈禱，並發誓若身體由此得以康復，便提筆為沙勿略大師寫傳。果真如此，康復後的神父履行自己的諾言，直至八十九歲逝世為止，他的整個一生都奉獻給了沙勿略研究。舒馬赫爾神父留下的著作有《沙勿略通訊錄》全二卷(1944-1945)、《舒馬赫爾著作集》全五卷(1962-1965)、《沙勿略傳》全四卷(1955-1971)，均為大部頭的巨作。神父採用遵循德國文獻史學之傳統的實證研究方法，他的成果將“沙勿略研究推向學術的巔峰”(1)。迄今沙勿略研究的共同點，不外乎是以恪盡職守地遵循天主教教會規則之聖人沙勿略這一大框架為前提，來展開16世紀這位偉大歷史人物的傳記的。聖人沙勿略在天主教會堪稱信徒的典範，被視為位於神與人之間，甚至僅次於神的值得崇敬的對象。舒馬赫爾神父的《沙勿略傳》亦站在相同立場，在究明沙勿略個人生涯和業績方面被認為是國外沙勿略研究之權威論述，如果說神父的著作給予直至今日的沙勿略研究以或多或少的影響，一點都不為過。

日本史學界專門從事沙勿略研究的有史學家岸野久，他以在羅馬的經歷為契機走上沙勿略研究的

*劉小珊，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東語學院教授，歷史學博士。

道路，著有《西歐人的日本發現——沙勿略來日本之前的日本情報研究》和《沙勿略和日本》兩部影響力較大的作品。岸野的研究與以往的研究不同：從歷史學角度探究他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作為一名傳教士所走過的道路。應該說，岸野的研究視角獨特，牽涉面較廣，令沙勿略研究有了新的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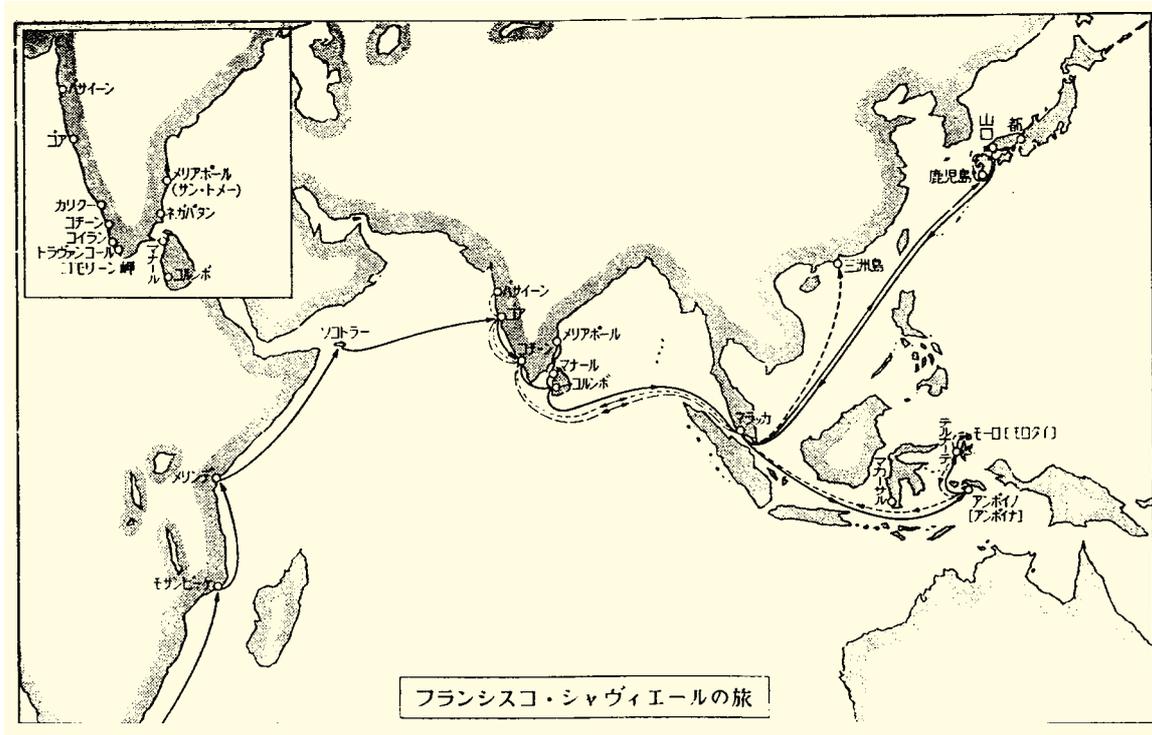
中國學者中對沙勿略傳教史的研究者甚少，近年戚印平先生在這領域有所建樹，其博士論文《日本早期耶穌會史研究》的第一部分主要就是對沙勿略日本早期開教的深入研究；其在《世界宗教研究》發表的〈沙勿略與耶穌會在華傳教史〉，則是研究沙勿略的另一篇重要論文。

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將立足點放置於16世紀亞洲傳教的時代大背景中，着重客觀追溯沙勿略早期於日本開教的歷史，並結合沙勿略之印度傳教經歷、中國傳教夢想，尤以在沙勿略日本開教中產生過影響的周邊人物為突破口，作一綜合性的探討，期望對該項研究做出一點貢

獻。本次史料的採用有池端彌次郎的親筆書翰、沙勿略的部下法蘭西斯克·佩雷斯（Francisco Pérez）所著《沙勿略傳》翻譯本⁽²⁾，其中存有沙勿略親筆函等原話記錄，對深入瞭解沙勿略其人應該是一個重要的線索。

一直以來，研究聖人沙勿略，如同見到太陽一般，那耀眼奪目的光芒令其周圍的人和事黯然失色，往往被研究者們所忽視。但是，沙勿略的卓越成就離不開他身邊眾多擁護者的支持，沒有他們的大力協助，沙勿略也不可能有如此顯赫的成就。因此，通過瞭解沙勿略日本傳教團其他成員的活動軌迹，以及他們於日本早期傳教中所起的作用，可以幫助我們正確地評價沙勿略和隨他早期赴日的傳教士們，以及給予他影響的周邊人物的功績，從而說明日本開教這一具有影響力的舉措，並非祇有沙勿略一位主角。

本文試圖展示一卷立體的、厚重的天主教教會日本早期開教的歷史畫面。



沙勿略赴亞洲的旅途線路圖

沙勿略對日本傳教目標的設立及策略

耶穌會是1534年由與新教宗教改革運動相對立、擁護舊教的西班牙貴族依納爵·羅耀拉(Ignatius de Loyola)為代表的七名天主教徒創立的。他們於1540年得到羅馬教皇的許可，以IHS(*Iesus Hominum Salvator*——耶穌人類之救世者——之略號)為紋章，其信條為清靜、純潔、耐貧、忍從，支持羅馬教會。為使瀕臨瓦解的天主教開拓出一片新天地，耶穌會把目光放在尚未接受天主教感化的東洋土地。日本天主教傳教的開拓者沙勿略，當時正在巴黎留學，他受到羅耀拉的感化，成為創立耶穌會、喚起天主教精神的羅馬教會的擁護者七人之一，因此被稱為“東洋傳道聖者”。

聖方濟各·沙勿略1547年在馬六甲會見日本人彌次郎，以此為契機，開始關注起日本。他在翌年4月2日的信函中表達了欲去日本的想法，並於一年後付諸行動，即於日本天文十八年七月來到鹿兒島開始日本傳教的第一步。在鹿兒島滯留的一年期間，沙勿略雖得信徒百餘名，卻因遭到佛教徒的激烈反對，以及貿易上的問題，並沒有獲得傳教的成功。之後，沙勿略帶領托雷斯和費爾南德斯轉向日本平戶。為向日本統治者謀求在日本合法傳教，沙勿略先後到了山口、堺市，其最終目標是京都；但當時京都於“應仁之亂”⁽³⁾後屢遭戰禍，且日本天皇的勢力衰落，傳教無望，沙勿略返回山口。山口是掌握中日勘合貿易⁽⁴⁾的日本大名大內義隆的居城，人口四萬，相當繁榮。沙勿略兩次謁見大內義隆，遞交了果阿的印度總督和大主教的信簡，獻上鐘錶、鐵砲、綢緞、眼鏡、玻璃器皿等西洋禮物，遂得到傳教許可⁽⁵⁾，兩個月內受洗的信徒達五百人。之後，沙勿略又前往豐後的府內(現大分縣)，得到領主大友義鎮(宗麟)的竭力支持和保護，傳教進展順利，不久府內成為日本天主教傳播的一大中心。

在該地傳教兩年三個月後，沙勿略離開日本。他根據這一階段的傳教經驗，制訂出更加周密可行的傳教計劃，特別是“耶穌會所實施的、給予傳教很多便

利的、利用貿易的策略都是沙勿略所倡導的”⁽⁶⁾。隨沙勿略一同前來並永久留在日本的托爾雷斯，以及後來三次巡視日本的耶穌會巡視員范禮安等眾多傳教士步沙勿略後塵，先後在豐後、平戶、博多、九州等地發展教會勢力，為日本的天主教傳教事業嘔心瀝血，得以留名於日本天主教的傳教史冊上。

本文接着將着重論述沙勿略在亞洲的傳教思想、對日本在亞洲傳教中的定位，及其在日本開教的初期成果，並結合沙勿略印度傳教經歷進行討論。

一、沙勿略印度傳教經歷

有研究者認為，沙勿略在構想赴日傳教策略時，一定參考過之前他在亞洲傳教的經驗，尤其是他傾注很大心血、較長時期在印度半島傳教的經驗。⁽⁷⁾以往歐美學者的研究從未對沙勿略印度傳教發表過肯定性的意見，且印度傳教與日本開教之間的關聯更是無人提及，僅從沙勿略本人發往歐洲的信函中得知，他對印度傳教結果並不滿意。然而負面的影響往往可作反面教訓，或許會生出正面的積極意義，因此在研究沙勿略早期日本開教的同時，瞭解他印度傳教之經歷顯得十分有必要。

赴日前三個月，沙勿略在1549年1月12日由交趾發給羅耀拉的信中談到他對印度傳教的展望及其對印度人的評價：

第一·當地出身的印度人是我所見到的各種族人中比較野蠻的。耶穌會士對付那些已經成為天主教徒，或是日本天主教徒的印度人都十分之辛苦。因此，尊師(羅耀拉)給予在印度的孩子們(耶穌會士)特別的關照，囑咐他們經常向吾主祈禱，因為尊師知道，要瞭解已經習慣於這種罪孽生活、完全缺乏理性的人們是多麼艱難的事情。(……)跟這類人打交道，精神上、肉體上承受的負擔驚人的大，況且，此地的語言(達羅毗荼語)很難習得。(……)憑我在印度當地的親身經歷，我尊敬唯一的父親(羅耀拉)!我確信我們的耶穌會若通過當地印度人來打開此傳教通道是根本不可能的。⁽⁸⁾

這封信函作為從印度轉向日本傳教的理由，難免有過高估計日本開教的未來、過度渲染印度傳教的負面之處，然而沙勿略從內心深處對印度天主教信徒的素質、印度傳教的未來是抱悲觀態度的，這一點毋庸置疑。沙勿略悲歎印度天主教徒品質的惡劣，將其原因歸咎於印度人的“野蠻本性”和“缺乏理性”。然而培養這些天主教徒的方式是否也存在問題呢？在1545年1月27日從交趾發給羅馬耶穌會士的信中，沙勿略提到這個問題：

我在一個月內給一萬人以上的信徒做洗禮是按照如下的順序來進行的：我來到這塊異教徒的土地——是為將他們改變成天主教徒被召喚而來——將當地所有的男人和孩子聚集到某一個場所，從父與子之間的告白開始，三次舉起十字架向唯一的主表露心跡，向聖父、聖子、聖靈禱告之後，唱頌祈禱辭：使徒的聖經、十誡、主的祈禱、阿門、瑪麗亞……。所有的祈禱辭都由我在兩年前翻譯成他們的語言（印度南部語言），並全部背下來。我身穿白色短衣大聲地按照剛才的順序唱頌祈禱辭，全體在場人員，無論大人或孩子都如我一樣唱頌。祈禱結束，我用他們的語言解釋天主教信條及十誡。隨後，我們面向我們的主神祈求對過去生活的寬恕，並在不欲加入天主教的不信教者面前大聲祈禱，目的為給惡人以警告，給善人以安慰。所有異教徒聽聞吾主的教誨十分震驚，為不知吾主之存在而活在世上感到困惑。異教徒們聽到我們的教誨，表現出非常滿足的態度，無論是否承認天主教是真理的人們都向我表示敬意。說教儀式結束，我針對信仰條文詢問所有的大人、孩子是否相信，他們全部回答“相信”。我再一次唱頌信仰條文後，再次詢問時，他們都將雙手在胸前合成十字，齊聲答道：“相信！”於是，我給他們實施洗禮，給每個人寫上洗禮名。禮畢，男人們回到各自家中，其妻子、家人隨後前來，我照前面的儀式一樣地給她們實施洗禮。(9)

這份信函對於我們瞭解沙勿略等傳教士在印度傳教的方式無疑是一份珍貴史料。當時，傳教士中無人會說當地語言，祇能通過當地人從中翻譯來進行傳教，而那些翻譯缺乏思想意識上的溝通，很難真正理解當地人的內心想法、實際感情、生活習慣和宗教信仰。其結果是全然不考慮印度人的立場，一味由傳教士作教理說明，讓到會者唱頌完全不明意思的禱告辭，且在他們尚未弄清楚天主教為何物的懵懂狀態，便在短時間內大量歸化徒有虛名的天主教徒。這般皈依的天主教徒一旦離開傳教士，勢必又回歸原來的宗教信仰，徒令沙勿略等人悲歎。究其根源，仍然是傳教方式存在問題。遭受挫折的沙勿略等傳教士肯定也意識到印度傳教中的種種不妥，在以後亞洲其它地區傳教時有必要改變方式。

二、開拓性傳教目標的設立

1547年12月，沙勿略在馬六甲從日本人彌次郎及其同行者葡萄牙商人那裡得到有關日本的諸多情報，對於正準備欲往印度以外地區開教的沙勿略而言，無異是雪中送炭。通過這些情報，他瞭解到：日本既無天主教之勁敵伊斯蘭教徒，亦無猶太人；日本人是一個對新鮮事物充滿好奇、重理性的民族；全國使用同一種語言；政治文化意識形態領域是一個中央集權體制的國家。沙勿略預測，將來日本“很多人都可能成為天主教徒”(10)，“我們神聖的信仰定能得到傳播”(11)，日本是一塊極有發展潛力的傳教地。沙勿略因此雄心勃勃地準備在這個島國發揮以往的傳教經驗，展開更為理想的傳教活動。

然而初到日本的沙勿略，並非實際地瞭解當地風情。他的傳教思想完全基於印度傳教的經驗教訓，而結合日本國情和日本人的國民性所作的綜合考慮的。對待重視理性、充滿好奇心的日本人，沙勿略沒有採用在印度實施的集團歸化方式，他提出了文化適應方針。根據此政策，外國傳教士必須首先學習當地的語言，並要求運用學會的語言正確地理解其社會、文化、宗教，為建立一個長遠可行之傳教目標，紮實做好每個階段的準備工作。沙勿略日本開教具體計劃的設定以兩年左右為活動期，因

為他早已期盼前往中國傳教。作為第一位進入日本的天主教開拓者，沙勿略的日本開教步驟引起相關研究的普遍關心，我們從他1549年1月12日由交趾發給羅耀拉的信函，以及1549年1月20日從交趾發給西蒙·羅德里格斯（Simão Rodrigues）的書信中可得知一二。

首先，是關於日本宗教的調查。沙勿略給羅德里格斯的信中是這樣記述的：

他（彌次郎）家鄉的人們將教誨寫在書籍上，保祿（彌次郎）不懂那些寫在書上的語言——是一種類似我們拉丁語一樣的語言，無法準確地告訴我們書籍上所記載的教誨傳達的意思。我到達日本後，若神主有此意旨，我將把他們書上所記載的事情——神主的由來——詳細地寫出來。⁽¹²⁾

在給羅耀拉的信函中，沙勿略繼續稱：

我打算詳細地寫下他們的習慣、書籍，以及在天主那些大學學到的東西。（……）我閱讀日本的各種書籍、與當地大學智識人士交往，可以詳細地寫下所有的事情。⁽¹³⁾

雖然沙勿略赴日前夕就從彌次郎處得到關於日本宗教的情報，然而他很清楚僅依靠那些資訊是無法真正瞭解日本宗教的。何況沙勿略早已洞察彌次郎的教養程度（不識漢字），他所提供情報不過一般民眾的常識水準，這種認識基準很難令曾經在巴黎大學講授過亞里士多德哲學課程的沙勿略滿意。況且，宗教與當地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連，不在這塊土地上生活、不親身體驗是難以理解的，這是沙勿略從印度傳教中得到的體會。因此，沙勿略一登上日本島，便與日本智識階層廣泛交往，博覽群書，試圖確切地瞭解有關日本宗教之本質所在。

第二，是調查過去日本天主教傳教的蹤跡。他在1552年1月29日由交趾發給歐洲耶穌會士的信件中有這麼一段話：

（我）在辛苦地瞭解在日本是否曾經有過“神”及有關天主教的智識。⁽¹⁴⁾

第三，則是日本天主教傳教的前瞻性。在給羅德里格斯的信中，沙勿略這樣寫道：

我已經將日本的情況，以及那塊土地上是否適合傳播我們神聖之信仰的狀況報告給印度，祈禱吾主保佑。⁽¹⁵⁾

沙勿略對日本的政治、社會、國民等情況作過綜合判斷以後，相信在日本有傳教的可能。為了達致這些具體目標，從亞洲情報中得知京城重要性的沙勿略，決意“首前往京城”⁽¹⁶⁾拜訪天皇及各個大學，為日後的傳教事業提供親身目睹經歷的確切情報。沙勿略作為先驅者在日本的一系列活動，在其部下法蘭西斯克·佩雷斯（Francisco Pérez）的報告〈關於印度耶穌會起源之傳教士法蘭西斯克·佩雷斯的報告〉中均有記載。佩雷斯是位深得沙勿略信任的傳教士，他被派往馬六甲，在當地與沙勿略會合，對聖人之日本及中國之行的目的和宗旨非常瞭解，該報告事實上可稱為最初的“沙勿略傳記”。佩雷斯在報告的結尾這樣寫道：

當時有一名在聖法蘭西斯會佔據重要位置的修道士指出：“傳教士法蘭西斯克〔指沙勿略〕過於頻繁地去各國巡視，我認為無此必要。”我（佩雷斯）將此話告知法蘭西斯克大師，大師回答：“我確信十分有必要。”接着重申，“如果我不去各地區巡查，怎麼可能瞭解當地哪些東西是必需的，怎樣針對這些必需來作準備？而且，給傳教士們制定行動方針也應該基於自身豐富的經驗，不外出瞭解如何獲得？經驗是深思熟慮（這一美德）之主要因素。”⁽¹⁷⁾

此報告一方面指出沙勿略當時在亞洲各地活動曾經遭到其它教會的批評反對，同時也對沙勿略的活動

作出總結性的概括。尤其是法蘭西斯克·佩雷斯直接引用的與沙勿略對話的部分，可視為沙勿略對來自各方反對意見的一種反駁，更揭示出沙勿略早期日本傳教目的之所在：到各個地區巡視，親眼驗證當地諸多現狀，在親身經歷的基礎上確定將來傳教的方向。

在異教徒的國度，傳教士必須承擔兩項使命：調查研究當地現狀，及實施實地說教和洗禮。沙勿略作為開闢日本傳教的第一人，比後來的傳教者更為重視其使命的意義。與類似於在印度傳教那樣大規模追求入會信徒數位的做法相比，沙勿略更主張站在長遠、宏觀的立場，腳踏實地地作好傳教之基礎的實地調查，並以此為研究課題。由此可見，沙勿略早期的日本開教活動主要致力於為將來的傳教作組織上思想上的準備，這是與繼他之後赴日的傳教士根本不同之處，而且祇有瞭解其中的差異，才能準確地認識沙勿略早期日本活動之意義所在。

三、開設堺市商館的構想

沙勿略赴日，首先抵達的是鹿兒島。《方濟各·沙勿略通訊錄》：

於1549年8月聖母節（8月15日），將我們引到了我們嚮往已久的這一土地。因無法進入日本的其它港口，我們故往鹿兒島。這是聖教安東尼奧的家鄉。不管是不是他的親戚，眾人熱烈歡迎我們。⁽¹⁸⁾

鹿兒島領主島津貴久對外國客人的來訪表示熱烈歡迎，並且與沙勿略之間達成了“某種默契”，因為在這次會見後，沙勿略立即走上街頭，用他“最熟悉的習慣方式傳教”⁽¹⁹⁾。在鹿兒島，沙勿略在為日本傳教進行積極的語言準備。沙勿略最初設想傳教方針是“自上而下的傳教”。《日本教會史》載：

他計劃到達該地後，立即訪問日本國王和這一王國中眾多領主居住的京都的宮廷，從國王那裡獲得在日本全境向所有希望接受我主教義的日本人傳播教義的完整許可。⁽²⁰⁾

故沙勿略抵達鹿兒島時，即要求領主為他提供船隻將其送往京都；不久又提出建議要開通日本-印度間的定期航道；在日本最繁榮的城市、全國金銀之集中地、其地理位置與擁有九萬餘人口的城市（京都）相鄰接的堺市建構堺市商館。

沙勿略提出設立商館的建議，當然是島津領主歡迎的事情。然而關於設立的地點問題，沙勿略是建議設在緊靠日本京畿地區的大阪或者堺市，而不是鹿兒島，這就導致了沙勿略與島津貴久關係的破裂，最終出現了鹿兒島最初的禁教事件。⁽²¹⁾

但沙勿略提出在靠近日本京畿地區的海港城市建立商館的計劃與設想，在日本早期傳教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日本建立葡萄牙商館以推進葡日之間的海外貿易，通過葡日間海外貿易的發展，進而推進天主教在日本的傳播，這應是沙勿略這一構想的重要意義所在。這正如葡萄牙經濟學家布林傑亞·拉烏（Virgínia Rau）在其論著中所稱：

商館體系在中世紀的歐洲被當作進行國與國之間商業往來的一種手段廣泛使用。（……）在葡萄牙，特別是以15世紀的佛蘭德爾商館（feitoria da Flandres）為代表的商館廣為人知。商館的主要機能為從事通商活動，同時兼進行收集情報、進行外交、軍事和文化等活動。在亞洲，還經常加入精神方面（比如天主教傳教）的活動。商館會長（feitor）都是由國王任命的深得信任、有身份的人士擔任，他們聽從國王的訓令、按照中央官廳的指令行動。商館的規模：交趾商館有商務官一人，部下六人；1501年運河商館有商務官一人，書記二人；1502年莫桑比克商館有商務官一名、其他人員十名。平時商館內沒有備置防身外用的武器裝備，故無力抗拒外來的襲擊。

身為官吏的商務官在嚴格的規定下執行商館的活動，有定期向中央官廳報告的義務。中央官廳匯集由各個商館發來的情報——商品名、數量、價格、市況、購入、販賣時期等等，再提供給各個商館。商務官經常跟任職地的商人接觸，

保持商品交易的絕對許可權，參與商品的購買和販賣。(22)

由此說明商館是連接中央官廳與海外各地商品流通的統一管道，同時可見沙勿略提案設立堺市商館的用心所在：商館不同於建立於某小島上的貿易據點，規模再小也是一國家機構，是一個可以駐紮商務官和若干人等的長期設施。沙勿略此提案更是以與埃斯塔特·達·印第安各地商館聯手協作為大前提，欲將日本放置於該勢力範圍內，他的想法與致力於擴大埃斯塔特·達·印第安政治、經濟勢力的印度總督、馬六甲長官，以及葡萄牙商人的利益不謀而合。

事實上，沙勿略提出此提案不僅有將日本圈入埃斯塔特·達·印第安勢力範圍之意圖，還包含將貿易所得利益積極用於傳教事業的設想。這點在他1549年寫給馬六甲長官希爾瓦的“沙勿略信函”中表露無遺：

如果閣下信任我，將閣下贈送之商品給予我——當地的管理者⁽²³⁾ seu feitor em estas partes da fazenda que mandar，我可以作如下保證：我可以用以往馬六甲官員誰都不曾使用過的確切可行的方法，把一（利益）變成十。此方法就是將所有的商品送給該國土上的意慾成為信徒的貧困者。(24)

此信函充份表達了沙勿略親身擔任商品的“管理者”、將所得到的商品贈予願意加入天主教的當地住民，有利於傳教開展之良苦用心，從側面反映了身處日本早期開教艱難形勢中的沙勿略其現實主義的態度。

誠然，沙勿略作為傳教士的最終目的無疑是純粹地傳授教義，但為了更有效地達致此目的所採用的“聖俗一體”，客觀上將促進日本傳教事業的發展。正如沙勿略在1549年11月5日寫給安東尼奧·戈梅斯的信中所言：

傳教士們來日時，請務必帶上總督寫給日本國王的信函，以及若干商品和贈品。我以神的名義確信：如果日本國王皈依我們的信仰，將會給葡萄牙國王帶來鉅大的物質利益。因此，有必要在堺市建立商館。這個城市是一個很大的港口城市，聚集着很多富裕的商人，金銀比日本的地方都要豐富。(25)

在此信函中，沙勿略闡明日本國王改宗將給葡萄牙國帶來的利益，以及對設立堺市商館的期望。對於沙勿略來說，天主教的傳教與經濟利益的追求不但不對立，反而應該作為葡萄牙國家事業的一個重要環節來確定日本開教的地位，力圖在此利益的支持下有利地開展傳教活動。國家權力和教會若即若離的關係被視為在保教權之下進行海外傳教的天主教會之特點，沙勿略的日本早期開教也不例外。

最後的事實亦證明，由於葡萄牙商船進入府內日出港的貿易，府內的天主教事業獲得了迅速的發展；由於葡萄牙富商在平戶建立商館，而且在很長的時間內，平戶成為葡日商船貿易的唯一港口，平戶的天主教亦獲得相當的發展。其它如大村純忠領地的瀨浦橫港和福田港都是如此。這種用世俗利益來推動日本各地方的天主教傳播帶來的結果是利弊參半。因為，“在大多數的時候，地方大名對於傳教士的支持及其堅定程度，與世俗利益的獲取數量成正比。一旦要求未能滿足，他們便會立即實行禁教或極度迫害教徒。”⁽²⁶⁾但沙勿略提出這一構想對於天主教傳入日本的初期所起積極作用還是很大的。

沙勿略等人開拓性的傳教活動給後來者以極大影響：受到他們撰寫的關於日本和日本人的信函和報告的強烈震撼，許多西方傳教士懷有向日本人傳授天主教的目的，抱着遠大期望和理想，不顧重重艱辛和危險渡海來到日本。正如《日本キリスト教史》所記載：

天主教傳教士自沙勿略登上鹿兒島以後的七十餘年間，足跡踏遍日本幾乎所有的區域，例

如，京都、九州、四國的伊予和土佐，形成了遍及日本整個地域的規模。16世紀末期，關東、東北地方在禁教迫害的狂風暴雨之中，天主教勢力仍從東北一直擴大到蝦夷地松前。⁽²⁷⁾

日本開教另一功臣：池端彌次郎

池端彌次郎是沙勿略早期傳教團的重要成員之一。在以往的研究中，他一直被視為沙勿略誤用“大日如來”的始作俑者，故他於當時鹿兒島傳教的作用遭到否定。通過對他親筆書翰的翻譯、整理，筆者認為有必要重新審視和評價彌次郎其人其事，不僅可弄清彌次郎在沙勿略傳教團所處的重要位置和積極作用，也可為沙勿略早期日本開教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視野。

一、對池端彌次郎的評價

1549年8月15日聖母昇天節，從駛入日本西南部鹿兒島的一艘中國帆船上，下來三個身穿黑色服裝的外國人——聖方濟各·沙勿略、托雷斯（Cosme de Torres—西班牙神父）、費爾南德斯（Juan Fernandez—傳教士）。緊隨他們身後的是鹿兒島武士池端彌次郎，此人是日本第一位天主教徒，幾年前因殺人罪而避禍海外。陸若漢在其大作《日本教會史》中提到此人時作如此介紹——

在當地（馬六甲）民眾中有一名叫彌次郎的日本男人，這個名字被很多書籍誤寫“Angero”。他為表明自己已遁世出家、獻身於拯救生靈，做做當地人把頭髮、鬍鬚都剃掉，改名為安西（ANXEY），接受洗禮後又改名為保祿，從此被人們稱為“聖徒保祿”。是主派遣這個男人來令那個王國（日本）的人民逐漸相信我們的神聖教義。（……）這個彌次郎出生於位於日本最南端的薩摩國的首都鹿兒島。（……）這個男人在年輕的時候做過很多壞事，因為多行不義，彌次郎害怕自己會被打入他原信仰的宗教所宣揚的地獄，故受到良心譴責，希望自己最終能夠進入極樂世

界。他抱着對極樂世界的憧憬，開始尋找贖罪和拯救自己的方法。⁽²⁸⁾

1547年，彌次郎在馬六甲結識沙勿略，被送到印度果阿的聖保祿神學院接受宗教教育，並終於受洗入教，教名保祿。彌次郎的勤奮好學給沙勿略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曾頗為興奮地告訴果阿的天主教傳教士：

如果所有的日本人都如他（彌次郎）般是同樣好學的國民，那我認為，日本人將是新發現的各國人民中最高級的民族。保祿來聽我的聖教說教，用自己的語言記下所有的信仰條文。他一再來聖堂進行祈禱，向我提出無數的問題。他有着旺盛的求知慾，對任何問題都刨根問底。他進步神速，在很短的時間裡就達到對真理的認識。這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²⁹⁾

從彌次郎那裡沙勿略初步獲得有關日本的資訊，激發起沙勿略對日本極大的興趣，甚至確信天主教信仰的傳播會在那個新近發現的島國取得成功，並終於促使沙勿略兩年後登上日本島、開始他的日本傳教生涯。當時彌次郎作為沙勿略的隨行翻譯一同到達日本。在日本史天主教研究史上，給予彌次郎的定位主調是：沙勿略進入日本的引導者、帶路人。海老澤博士在其“彌次郎考”中指出：

這位彌次郎的才華和信仰，以及他積極主張將福音傳至故土的熱情，事實上是導致沙勿略聖人啟程來日本的最大契機，這稱得上是彌次郎之最大功績。⁽³⁰⁾

二、在果阿聖保祿神學院的學習經歷

1547年，沙勿略在視察印度、傳教香料群島之後回到馬六甲時，由葡萄牙商人介紹認識了潛逃在此地的日本青年彌次郎。沙勿略瞭解到去日本傳教極有希望，便決定將彌次郎送到印度的果阿接受宗

教教育。⁽³¹⁾ 在1548年1月20日由交趾發給羅馬耶穌會會士的信中，沙勿略解釋了此舉的目的：

這段時期默在果阿的彌次郎葡語更加進步了。他見識了印度，同當地葡人交往，瞭解到我們的生活方式。這段期間，我傳授他教理知識，打算將《公教要理》全文和詳細記述吾主耶穌基督降臨故事的《信仰教條說明》一書翻譯成日文，因為彌次郎的日文寫得很好。⁽³²⁾

由此函可見，沙勿略已經把彌次郎作為日本之行的要員之一在作精心準備——

首先，讓彌次郎見識和體驗果阿的葡人社會，及他們的生活情形——果阿是葡萄牙控制亞洲的中心地，當時被稱作“黃金的果阿”，日後再由親眼目睹果阿繁榮的彌次郎向日本人宣傳這一輝煌。

其次，是學習葡語——彌次郎遇到沙勿略時，已經能夠用葡語進行日常會話，作為傳教團的翻譯還有必要繼續提高葡語水準；再者，是天主教教理的學習——加深對宗教信仰的理解和認識，不僅是彌次郎本人之必需，更是適應將來傳教的需要。

第三，是教理書籍的翻譯——《公教要理》和《信仰教條說明》兩書均為傳教士去日本傳教的必備書籍。

最後，是提供有關日本情報——沙勿略等傳教士事先儲備、熟悉與日本相關的知識和材料，將有利於日本傳教計劃的制訂。

在如此精心安排下，彌次郎和其他兩名日本人，1548年3月到達果阿，進入聖保祿神學院，直至1549年4月隨赴日傳教團出發去日本前在該學院默了一年多時間。其間的學習一直在學院院長蘭奇羅特·尼果拉沃(Nicolao Lancilloto)的悉心指導下進行。關於彌次郎的學習成果，蘭奇羅特的“日本情報”中是這樣記載的：

去年四月(應是三月)從那個島上(日本島)來了一位極富才華、聰敏能幹的青年人，他十分瞭解我們的信仰和生活，僅通過短時間的學習，

便成為天主教徒。他和我們一起在果阿神學院(聖保祿神學院)讀書、用我們的方式學習寫文章，歸納信仰和誡條(十誡)的要點，翻譯成他本國(日本)的文字。他勤勉於祈禱和靜默，真誠地祈求耶穌基督的保佑。他的善良，用筆墨難以描述。在接受我們的教理問答時，他講述了關於他國家的習俗和宗教等諸多事情。⁽³³⁾

由聖保祿神學院院長對彌次郎的一番評價，可知彌次郎通過一年多的學習已取得沙勿略所期望的成果：語言學習、教理教育、教理翻譯、日本情報的提供，也就是說，沙勿略把彌次郎作為日本傳教團的主要成員送往果阿培養的目的得以成功實現。

三、隨沙勿略傳教團登上鹿兒島

日本天文十八年(1549)，沙勿略等人的帆船抵達薩摩的鹿兒島，同行的有兩名西班牙傳教士托雷斯和費爾南德斯、池端彌次郎及其弟約翰，以及僕人安東尼奧，一共六人。在此地，沙勿略受到領主島津貴久的盛情接待，並獲得傳教的許可。⁽³⁴⁾沙勿略與當地的日本人廣泛接觸，他眼中的日本國民是傑出、優秀的，尊重武器、信賴武術，視名譽高於金錢的有着良好素質的人民，沙勿略通過書信將自己對日本人的印象向歐洲做了詳細的報告。沙勿略在鹿兒島召集群眾傳道之初，人們以為他宣講的天主教不過是佛教的一個派別，靜心聽講，從而獲得百餘名信徒。當人們明白真相——原來是排斥佛教的天主教後，引起佛教徒的強烈不滿，反抗情緒最終迫使島津貴久不得不禁止傳教。⁽³⁵⁾沙勿略在鹿兒島傳教前後不滿一年，值得關注的是這一年中彌次郎到底協助沙勿略具體做了哪些工作？我們從幾份史料中可以窺見一二。沙勿略1549年11月5日由鹿兒島發給果阿耶穌會士的信中這樣說道：

這塊土地上的公爵貴久很高興他(彌次郎)的到來，給予他很高的榮譽。而且，向他諮詢葡萄牙人的生活習慣、勢力範圍等各種各樣的事情，保祿(彌次郎教名)很詳細地給予介紹，令公爵十分滿意。⁽³⁶⁾

彌次郎因為通曉葡萄牙人和果阿社會的各種重要情況，故受到當地人的尊重，很自然成為領主島津貴久和沙勿略傳教團的中間聯絡人，為沙勿略傳教作嚮導。在同一封信函中，沙勿略稱：

聖米格爾日（9月29日），我們和這塊土地上的公爵進行了談話，他對我們非常熱情，說是要把寫有天主教教誨的書籍珍貴地保存。還說，如果耶穌基督教果真是一種聖教，那麼惡魔該倒楣了。（37）

這是對沙勿略和島津貴久一次見面情形的描述，其中並未明確指出當時擔任翻譯的為何人，但除了彌次郎之外無人可以勝任。此外，彌次郎還陪同沙勿略拜訪島津氏的菩提寺福昌寺、同東堂仁室對話。葡萄牙傳教士陸若漢通辭記下了當時他們在該寺山門說教的情形：

福者傳教士打開已經翻譯成日文，用我們的文字（羅馬字）書寫的信仰玄義書籍，高聲地朗讀其中的信條，翻譯保祿在一旁向聽眾作着說明。（38）

沙勿略在1549年11月5日的信中還寫道：

今冬，我們打算稍微詳細地將《信仰教條說明》*declaración sobre los artículos de la fe* 製作成日文版印刷出來。（……）我們親愛的保祿忠實地將這些拯救靈魂所必需的書稿翻譯成日文。（39）

在1552年1月29日從交趾發給歐洲耶穌會會士的信中，沙勿略也寫道：

在保祿故鄉那年，我們（……）從事了一項重要的工作：將記載着天主教誨的許多資料翻譯成日文。（40）

後來成為南蠻翻譯的費爾南德斯也參與了這項複雜且艱難的翻譯工作，由於他的日文水準有限，主要翻譯大部分仍由彌次郎承擔。1549年發給的信中還有這樣的記載：

我們友好的同事保祿，夜以繼日地熱心向他周圍的親人、熟人說教，他的母親、妻子、親屬和許多朋友都皈依了天主教，此時的他已經是一名天主教信徒。（41）

在1552年1月29日從交趾發出的信中，沙勿略也稱：

（他）在這裡向自己的親朋好友做過多場說教，歸化了大約百名天主教徒。（42）

從以上兩封書信的內容可以看到一個事實：彌次郎代替不懂日語的沙勿略實際作了很多的傳教工作。在1552年從交趾發出的信中還有一段話，沙勿略是這樣敘述的：

為了讓本地出生、十分善良的天主教徒保祿教授教理、引導皈依，將（他）留在了這些天主教徒們的身邊。（43）

彌次郎向新皈依的天主教徒宣講教理是早已制訂的計劃，他所進行的教理教育在沙勿略離開鹿兒島之前，就已經在向異教徒說教時同行進行。沙勿略1549年11月5日的信中還有關於彌次郎編寫教理書的描寫，他稱：

這位婦人（貴久的母親）請求為她寫一些天主教徒信仰的東西（教理），為此，保祿忙碌數日終於作成，將有關我們信仰的很多事情用國語（日語）寫了下來。（44）

綜上所述，彌次郎隨沙勿略傳教團進入日本鹿兒島早期傳教所作的貢獻不小，一年間從事的工作涉及諸多方面，列表歸納如下：

池端彌次郎鹿兒島活動內容（1549-1550）

序號	活動內容	相關對象	史料出處	史料時間
1	中間聯絡人、嚮導	沙勿略、島津貴久	由鹿兒島致果阿耶穌會士函	1549
2	口語翻譯	沙勿略、島津貴久 鹿兒島的異教徒	1) 由鹿兒島致果阿耶穌會士函 2) 《日本教會史》	1549, 1970
3	文字翻譯	天主教教理書	1) 由鹿兒島致果阿耶穌會士函 2) 從交趾致歐洲耶穌會士函	1549, 1552
4	說教	鹿兒島的異教徒	1) 由鹿兒島致果阿耶穌會士函 2) 從交趾致歐洲耶穌會士函	1549, 1552
5	教理教育	新皈依的天主教徒	從交趾致歐洲耶穌會士函	1552
6	編輯教理書	島津貴久之母	由鹿兒島致果阿耶穌會士函	1549

從上表中所列幾項工作的性質來看，可分為與語言有關的翻譯工作和與天主教相關的傳教工作。彌次郎作為沙勿略傳教團的一個成員，給人們的印象是隨行翻譯，主要擔任沙勿略的口舌之重任，故他在鹿兒島為早期傳教所做的種種努力被以往的研究所忽視。然傳教團到達鹿兒島時正值室町後期的戰國年代，沙勿略的到來雖然受到鹿兒島領主島津貴久的熱烈歡迎，但最初的傳教活動並不十分順利。對此，《日本教會史》中有一段詳細的描述：

（……）鎮上有個被稱為福昌寺的宏偉寺院，它屬於禪宗宗派的僧侶所有。寺院面前是廣場，廣場邊有一座山門，與圍繞着寺院的圍牆相連，還有登上寺院的石頭臺級。神父來到寺院，為了使大家看到他的形象，聽到他的聲音，他位於石級的最高一層。神父眼望天空，為驅趕惡魔、不使它們妨礙聖言的效用，神父對自己和聽眾劃了十字。神父打開（羅馬文字）書寫的有關信仰玄義的書，高聲朗讀記寫於其中的玄義。書中的內容已經得到翻譯，通辭（翻譯）彌次郎在向聽眾作着說明。

（……）由於日本人與生俱來的傲慢心理，說教者的教理、風度、服裝、容貌、奇特的動作，以及用他們從未聽到過的語言讀書時的奇怪發音，使他們產生輕蔑和揶揄的心情。有人大笑。有人說“我不懂這夥人說些甚麼”。也有人

嘲笑、辱罵神父說的話語：“這個家伙說的真是些糊塗的昏話。”甚至還有人質問彌次郎：“這個男人神經正常嗎？他不是胡說八道吧？”⁽⁴⁵⁾

在最初的傳教活動中，彌次郎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他是沙勿略鹿兒島傳教最為重要的助手，他不僅為沙勿略的街頭說教充當翻譯，還協助沙勿略編寫最初的日語教義，將教義中至關重要的條文譯成日文，儘管按當時他的翻譯水準自然會有不少錯誤。但沒有彌次郎的幫助，沙勿略在日本傳教必然寸步難行困於實施。彌次郎還將他的親戚朋友介紹入教，在短時間裡，鹿兒島的天主教徒就發展到百餘人之多。因此，依據史實重新認識彌次郎其人在沙勿略傳教團中的重要性顯得尤為必要。

葡萄牙商人在日本開教中的作用

從1543年葡人初到日本，到1549年沙勿略來日這段時間，不少葡人先後到達這個島國，他們大都是貿易商人。這些人逗留日本期間，其有意無意的言行舉止已將基督教文化帶進了日本社會。對此，傳教士陸若漢通辭（João Rodrigues Tçuzu）在《日本教會史》中記述道：

葡萄牙人在日本開始貿易以來的五、六年間，通過同日本人的接觸，傳授給該國人有關吾

主宙斯國之知識若干，多少讓他們瞭解到還有與日本人信奉的宗派不同的教宗，人們來世可以因此教宗得到拯救。⁽⁴⁶⁾

陸若漢明確指出在沙勿略日本開教之前葡萄牙商人所發揮的顯而易見的作用。此外，日本史學家岡田章雄在《天主教·伴天連——傳教和信仰》中也提到沙勿略之前日本天主教影響一事：

1542年，葡萄牙人最初到達種子島，自此，九州地區各港口年年均有葡國之商船駛入。可以想象居住當地的人們在沙勿略到來之前，便已經由來港的船員聽聞天主教這一信仰，以及隨之負載的文化。⁽⁴⁷⁾

儘管早有17世紀傳教士陸若漢通辭的記述，近代有岡田章雄所指出，然而國內外學術界將葡萄牙商人活動與沙勿略早期日本開教相關聯的研究成果仍然罕見。究其原因，可能是由葡商自身形象所致。提起葡萄牙商人，正如門德斯·平托（Mendes Pinto）《遠遊記》中描繪的那樣：都是貪圖暴利唯利是圖之輩。有此根深蒂固的印象，則很難將葡商人以牟利為主的貿易活動與傳教士神聖的開教混為一談，故論述二者之間關係的研究一直處於被忽視的狀態。但通過對沙勿略、彌次郎信函日譯文的整理調查，發現正如陸若漢、岡田章雄指出的那樣，我們有必要弄清楚日本初期開教同早期渡海赴日的葡萄牙商人之間的關係。葡商同沙勿略的早期開教究竟是否有直接或間接的關聯？他們的貿易活動是否為日本天主教的傳播做出過貢獻？

一、日本九州一帶活動的葡萄牙商人

1543年以後，葡萄牙商人主要渡海至日本的南九州，其中也有往豐後地區活動者。豐後領主大友宗麟1578年接受洗禮前曾以回憶錄的形式描述自己同天主教的關係。⁽⁴⁸⁾回憶錄中提到兩位葡商若爾傑·德·法利阿（Jorge de Faria）和迪奧果·瓦斯·德·阿拉甘（Diogo Vaz de Aragão），這兩人在當時同期來航日本的葡萄牙人中很明顯佔領導者的地

位。据弗洛伊斯同一信函稱，大友宗麟十六歲時（1545）便有六、七名葡萄牙人乘坐中國帆船進入日本府內附近的港口，這些人當中有一個名叫若爾傑·德·法利阿的富商是他們的頭兒。格奧爾克·希爾罕馬神父推測，此法利阿就是1577年6月6日由白杵發往羅馬伊魯曼之弗洛伊斯信函中提到的葡人。⁽⁴⁹⁾該信函中關於法利阿有這樣一段記錄：

（……）由支那渡船往來日本的初期，我（宗麟）所在地有一名葡人曾滯留三年，此人為被槍砲擊傷之吾弟一山口王（晴英）治療傷口。我經常向他打聽葡萄牙、印度的國情和形勢，特別詳細地瞭解宗教信徒們的教規、生活狀況，此葡人所言是否果真實？我未向他坦言內心的疑惑，專程於二十六年將自己異教徒的家臣送去印度考察。⁽⁵⁰⁾此家臣回來詳述其在異國的親身經歷，由此我終於成為天主教徒（洗禮名是洛倫索·佩雷拉）。我此舉不僅因為家臣親眼目睹的事實，也有先前那位葡人對我產生的影響。⁽⁵¹⁾

據此線索，自1545年的三年間，葡萄牙商人若爾傑·德·法利阿就滯留日本，宗麟同法利阿之間有關於葡萄牙受印度統治等政治、軍事方面，以及宗教信仰生活、教規方面的話題討論。有一點值得關注，宗麟何故對葡萄牙人宗教信仰格外關心，對此，1578年弗洛伊斯的信函中稱：

當地來了位名叫迪奧果·瓦斯的葡人，他在此地滯留五年，已通曉日本話。此人經常早晚捧着一本書，或是念珠做禱告。我（宗麟）詢問他是否在向日本的“神”、“仏”做祈禱，他笑稱自己祇崇拜天地之創造者、拯救這個世界的“主”。我對此事很在意，總是放在心上；此人不過一世俗商人，連貿易之事尚要做禱告，祈禱商事的順利，毋庸置疑，他所崇敬的宙斯是極為重要的，這是一種很有價值的玄義。從此後若干年，我一直為帕德雷·巴爾塔扎爾·卡果（Baltasar Gago）和他的伊魯曼居住府內盡力。⁽⁵²⁾

一般認為，迪奧果·瓦斯到達豐後，及其前後活動時間，應該在先期赴日的法利阿之後，即帕德雷·卡果來日（1552）前的1547，或者1548年，此後五年間默在豐後，直至1552年，或1553年。但從1552年瓦斯在中國上川島照顧沙勿略這一史實可推知：瓦斯滯留豐後應在1547-1552年間。沙勿略早期在日本開教的1549-1551年，瓦斯已在豐後，並在此地幸遇沙勿略。之後的1552年他悉心照顧身患重病的沙勿略，並提供小屋給聖人居住。⁽⁵³⁾ 1556年，瓦斯前往平戶，1568年再度登上豐後，並將宗麟寫給主教卡爾內伊洛的書信帶往澳門，由此可見，瓦斯這位日本通是活躍在16世紀中葉東亞的葡萄牙商人中的重要一員。這位商人瓦斯早晚於一定的時間手捧聖書或念珠作禱告，不過是作為天主教信徒習以為常的一種必要儀式，並未帶有其它目的。目睹一位普通葡萄牙商人在日本虔誠祈禱之情形，卻讓當地領主宗麟大為感動，從此對瓦斯的信仰和他所崇拜的對象產生極大的興趣。宗麟之外，當時受滯日葡商日常信仰行為為影響並因此對葡人宗教信仰產生興趣的日本人肯定不在少數。

1549年5月下旬，沙勿略赴日本傳教團一行人到達馬六甲，葡萄牙商人寫給沙勿略的信函正巧送達，信中報告了葡萄牙人因不同的信仰行為為給日本社會帶來的影響。在1549年6月22日由馬六甲發往羅馬耶穌會士的信函中，沙勿略是這樣記述的：

（葡商）給我的信中進一步稱，有幾名葡萄牙商人一到達日本某地，該地領主即命令他們住進無名氏房屋。因為，當地人說那裡住着惡人，故沒人敢去居住。住進荒蕪小屋的葡萄牙人時常會感覺有人在拉扯他們的衣服，仔細尋找又不見作亂者的蹤影，好生奇怪。某夜，一個葡商的隨從產生幻覺，便開始尖叫。葡萄牙人以為發生異常事件，紛紛拿起武器圍攻過來。當詢問尖叫的原因，才得知是由於幻覺引起。於是，葡人在住房周圍豎立起十字架。事後，當地的居民也追問那夜晚尖叫是因為何故，葡人回答是隨從受驚嚇

所致。領主更加確信那些房屋裡有惡魔作怪，並稱驅逐惡魔的方法似乎除了十字架別無它法。自葡萄牙人在屋內外豎立十字架開始，居民便如此做，很快當地各處都出現十字架。⁽⁵⁴⁾

史料所顯示的日本“某地方”究竟為何處，無法考證，但肯定是日本九州某一個地區。

僅從此現象，便可知在傳教士正式傳播天主教之前，葡萄牙人宗教信仰已經走進日本普通民眾的生活。意義不同的是，上面所提大友宗麟抱着對探究葡人信仰本質為何物的關心，是一種理性、知識的態度。與此相反，看到葡萄牙商人為驅除邪惡豎起十字架，日本人也模倣豎立，表現出一般民眾企圖借助異教神靈威力驅逐當地惡魔的極具現實利益的態度。類似這般為謀求實際效果，從世俗利益的動機出發來關心外國宗教信仰——天主教的日本人應該為數不少。

二、協助彌次郎逃跑的葡萄牙商船

1546年，有三艘葡萄牙商船駛入薩摩，船主分別是阿爾瓦羅·瓦斯（Álvaro Vaz）、費爾南德（Fernando）、洛倫索·伯特遠（Lourenço Botelho）。《彌次郎書函》特別提及前兩艘商船，當時因犯殺人罪遭官兵追捕的彌次郎正躲藏在寺廟中。彌次郎在信函中這樣記述：

當時，有一艘前來貿易的葡人船隻停泊此地，這些人中有一人叫阿爾瓦羅·瓦斯，我以前就認識他。他瞭解到我犯的事情，問我是否有去馬六甲的打算？我回答說正想如此。他說馬上給正準備出發的、在同一海岸另一個港口的費爾南德紳士寫信拜託此事。⁽⁵⁵⁾

此函首先提到前來謀求救助的彌次郎和阿爾瓦羅·瓦斯是舊相識關係，說明兩人的相遇並非偶爾，應為彌次郎的特意前往。如前小節所述，滯日葡人飲食起居習慣，以及他們的宗教信仰無形中讓日本人受到感化。或許彌次郎也是通過阿爾瓦羅·瓦斯的日常行為和信仰活動，相信他基於天主教的仁慈可

能會幫助自己脫離險境，故前往求助。結果正如彌次郎所預見的那樣，瓦斯向彌次郎伸出援手並未想到將來可能發生的事情，僅僅出於一種人道主義的考慮——解救彌次郎於官兵追捕的緊急狀況中。

據《彌次郎書函》記載，匆匆逃往馬六甲的彌次郎沒有搭乘瓦斯寫信拜託的菲爾南德商船，卻錯上了若爾傑·阿爾瓦雷斯 (Jorge Álvares) 的商船前往馬六甲。到達目的地，正巧阿爾瓦雷斯極力勸告彌次郎會見的沙勿略不在此地，準備折返日本的彌次郎途徑中國港口澳門時，不期與瓦斯和彌次郎再度相會。《彌次郎信函》對他們的重逢如此記述：

返回支那時，與我在國內認識、勸我來馬六甲的阿爾瓦羅·瓦斯相遇了。他為我的返回、為老天讓我們在此地相遇感到吃驚。當時他正在駛往馬六甲的船上，便勸我一起回去。另一位叫做洛倫索·伯特遠的也同樣勸我。這些有身份的人說，如果我返回馬六甲，便可以見到傳教士聖人弗朗西斯科·沙勿略，從此可以去果阿的聖保祿學院學習（天主教）信仰，有朝一日，可能伴隨傳教士返回日本。我覺得他們說的極是，便與冲地隨他們開始了這次航海。⁽⁵⁶⁾

此次瓦斯和彌次郎二人的再度相逢，對改變彌次郎的人生有着三層重大意義：1) 返回馬六甲，得以見到盼望已久的沙勿略；2) 進入果阿聖保祿學院，學習天主教信仰；3) 1549年隨沙勿略傳教團返回日本。⁽⁵⁷⁾

從來的研究一直認為彌次郎的果阿之行，以及進入果阿聖保祿學院學習天主教教理是出自於立志日本傳教之沙勿略的主意。事實說明，在沙勿略之前，葡萄牙商人阿爾瓦羅·瓦斯、洛倫索·伯特遠等人已經有了這些考慮，不過是在沙勿略的幫助下實現了這些夢想。據史料，我們可以做出這樣的推測：當瓦斯再度遇到彌次郎、親自帶他去馬六甲時，已不再僅僅出於解救他個人出險境的目的，可能已考慮到將來讓日本人改變宗教信仰等問題。最有力的證據是聖保祿學院是所專門為培養當地青年

成為天主教傳教人員所創建的學校，如能進入該校學習，彌次郎必定會成為將來日本正式傳教之很好的向導。

三、若爾傑·阿爾瓦雷斯對沙勿略的影響

在沙勿略日本開教中貢獻最大的葡萄牙商人當屬若爾傑·阿爾瓦雷斯 (Jorge Álvares)。正如彌次郎在其書函中所稱：“若爾傑·阿爾瓦雷斯陪伴我前往馬六甲，給予熱情款待，進而把我托付給傳教士弗朗西斯科 (沙勿略)。”⁽⁵⁸⁾ 阿爾瓦雷斯為彌次郎與沙勿略的會面起到重要的引路作用，彌、沙二人的會面成為日本天主教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被稱作“輝煌第一頁”的事件。⁽⁵⁹⁾ 從此，沙勿略通過彌次郎等三名日本人，對尚未涉足的日本，以及住在島上的日本人開始產生極大興趣。1549年7月，沙勿略終於由彌次郎領路，來到其故鄉鹿兒島，至此打開天主教傳教的通道。值得關注的是，阿爾瓦雷斯為沙勿略引薦彌次郎的意圖何在？

據史料分析，葡商的意圖首先是出於崇敬。若爾傑·阿爾瓦雷斯十分崇拜沙勿略，他聽說過許多有關聖人執着於向異教徒宣傳天主教、經常四處尋訪合適傳教地區的傳說。阿爾瓦雷斯1546年滯留日本期間，發現日本人是一個極具理性的民族，若向日本人傳教有望成功。阿爾瓦雷斯欲將自己的見聞和想法轉達沙勿略，力勸傳教士來日本傳教。恰逢此時，企圖逃避殺人罪責的彌次郎前來求助。在前往馬六甲的航海途中，阿爾瓦雷斯逐漸瞭解到彌次郎其人的才能、人品，以及葡語能力，於是他得出結論：彌次郎是勸說沙勿略赴日本傳教的最合適人選。第二層因素出於貿易的需要。阿爾瓦雷斯身為葡萄牙商人，日本若被皈依，隨着傳教士的進入成為天主信徒者日益增多，對其所經營之貿易活動肯定有利。這種出自商人本能的利益打算不可不視為一個重要原因。第三個原因應該是出自於天主教徒的使命感——讓異教徒改教、拯救他們的靈魂，這一天主教徒的良心和使命感也可能是一個很大因素。若僅為貿易上牟利，阿爾瓦雷斯不可能置自身危險於不顧，幫助彌次郎脫離險境，且出資、獻策，將彌次郎辛苦地送到馬六甲、果阿；且在引薦

之前，阿爾瓦雷斯已在積極做相關準備，如彌次郎所稱：

他（若爾傑·阿爾瓦雷斯）給我講述傳教士沙勿略的生平和業績，我內心產生一種務必見到傳教士的強烈願望。⁽⁶⁰⁾

阿爾瓦雷斯在亞洲各地宣講沙勿略的故事，傳播聖人的美名。他的熱心宣傳令彌次郎愈發迫切期望見到傳說中的傳教士，在彌次郎的信函中，他繼續描述道：

這個若爾傑·阿爾瓦雷斯在航海途中，一路向我講述天主教徒是怎麼回事，多少激起我欲接受洗禮的心情，而且，這種念頭越來越強烈。⁽⁶¹⁾

航海途中，阿爾瓦雷斯還向彌次郎解說天主教教理的初步原理。彌次郎通過他的啟蒙教育，逐漸產生這種想法：如果見到天主教宗教的代表者沙勿略，便可以赦免曾經犯下的罪行，重新求得心靈的平靜。如此可見，阿爾瓦雷斯成功地完成了對彌次郎的初期教化工作。

當另一葡商阿爾瓦羅·瓦斯在澳門港重逢欲返回日本的彌次郎時，已明顯感到他發生的變化，推測是阿爾瓦雷斯施加影響所致。瓦斯繼阿爾瓦雷斯之後，更加積極幫助、鼓勵彌次郎達成心願。沙勿略信函中有這麼一段記述：

從日本回來的所有葡萄牙商人均向我進言，如果我去日本，會感到日本人是理性而具有想象力的，比起印度的異教徒，他們更能為吾主做出奉獻。⁽⁶²⁾

由此可見，促進日本開教是從日本歸來之葡萄牙商人的共同心願，他們如同一條連環的鎖鏈，自覺地相繼加入到幫助彌次郎會見沙勿略的前期準備過程中。沙勿略在信中繼續稱：

他們（葡萄牙商人）認為，如果在那個島上（日本島）推廣我們的信仰，日本人會表現出印度異教徒身上從未有過的旺盛的求知慾，會比在印度任何區域都要獲得豐碩的成果。⁽⁶³⁾

阿爾瓦雷斯等對日本人的高度評價深深打動沙勿略，以至聖人後來見到彌次郎也發出類似的感慨：“如果日本人都如彌次郎這般富有知識，那麼在新發現的各個地區，日本是最具有豐富知識的民族。”⁽⁶⁴⁾此時的沙勿略“在內心”已經決定他“自己或者耶穌會的其他傳教士，兩年之內將赴日本”⁽⁶⁵⁾傳教。

阿爾瓦雷斯不僅極力闡明日本開教的可能性，還應沙勿略要求，執筆撰寫“日本情報”。對此，沙勿略信函中亦有記載，稱：

我拜託他（阿爾瓦雷斯）將（日本）當地、居民的情況、所見所聞到的各種情形做成報告，他寫了詳細的報告書給我。⁽⁶⁶⁾

這份“日本情報”不僅成為沙勿略瞭解日本的最初資料來源，也為在印度和歐洲傳教的相關人員提供了一份取得印度總督和殖民地高官們理解和支持的有份量的第一手材料。在為日本開教的準備工作中，阿爾瓦雷斯最後一項任務是親自送彌次郎去果阿。對此，沙勿略在信中這樣寫道：

我本來是很高興這個日本人乘坐我來時的船舶，但他同欲前往印度的其他葡萄牙人是朋友，曾經接受過他們的幫助和友情，他若不與之同行似乎不妥。⁽⁶⁷⁾

對此事，《彌次郎信函》是這樣記錄的：

那時，傳教士（沙勿略）吩咐我，同欲前往果阿的若爾傑·阿爾瓦雷斯一起為聖保祿神學院。⁽⁶⁸⁾

由上述信函可知，彌次郎同葡萄牙商人前往聖保祿神學院並非沙勿略的初衷，然他最終作出以尊重彌次郎和葡商之間友誼為前提的決定。這個小插曲更加說明在日本開教事業中葡萄牙商人所起到的不可忽視的作用，以及沙勿略對他們的功勞予以的充份肯定。

總結上述史料調查，清晰可見在沙勿略 1543-1549 年早期日本傳教過程中，若爾傑·德·法利阿、迪奧果·瓦斯·德·阿拉甘、阿爾瓦羅·瓦斯、費爾南德·洛倫索·伯特遠、若爾傑·阿爾瓦雷斯等六名葡萄牙商人參加其中，發揮着直接和間接的作用。其中阿爾瓦羅·瓦斯、若爾傑·阿爾瓦雷斯兩人對沙彌的影響最大，直接促成日本傳教史上的“最具意義的見面”。須闡明的是，葡商們抱有期望日本開教這一共同的目標，並非事先統一的思想，可視為是一種不約而同的集體團隊主義之信念。另外應該指出的是，以往的研究一直視日本早期開教源為馬六甲沙彌兩人“歷史性的會見”，筆者認為對促成這次見面的葡萄牙商人所作出的種種努力、建立的功績不能抹煞，有重新評價和認識的必要。

沙勿略前往中國傳教的構想

聖方濟各·沙勿略啟程赴亞洲是受耶穌會派遣，時年三十五歲。他 1542 年 5 月到達果阿開始天主教近代在東方傳教的拓荒工作，足跡遍及印度、馬來半島和新幾內亞等地。沙勿略致力於教育年輕人與奴隸，培訓印度人用當地語言宣揚教義，他每皈化一區，便委託其他會士接續其傳教工作，自己則前往新的地方開教。1549 年，沙勿略帶着兩名耶穌會士、一名翻譯、兩名僕人毅然轉往日本發展，在短短的兩年停留期間，雖領洗了千名教徒，卻深深體會作為遠東各國文化中心的中國，對天主教在東方弘教工作的重要性。他曾致書在歐洲的同道曰：

如謀發展吾主耶穌基督的真教，中國是最有效的基地。一旦中國人信奉真教，必能使日本唾棄現行所有各教學說和派別。⁽⁶⁹⁾

雖然沙勿略抱定進入中國的決心，但因當時明朝政府正施行海禁，故不顧其多方努力，始終事與願違，並在 1552 年 12 月卒於廣東外海的上川島。⁽⁷⁰⁾該島距離他殷盼開教的中國大陸僅約十公里之遙。沙勿略的去世引發了天主教會對入華開教的重視，在此後的三十年間，耶穌會、方濟會、奧斯定會和道明會均相繼派出會士，但都無法在中國立足，直到萬曆八年（1580），傳教士才稍稍打開僵局。

以往有關沙勿略的研究，一直把日本開教作為一個獨立的課題，其中提及沙勿略中國傳教思想的祇有格奧爾克·希爾罕馬神父的《法蘭西斯克·沙勿略中國傳教計劃的起源》⁽⁷¹⁾，他着重對 1545 年以來的“中國情報”作了編年體式的介紹，特別談及 1551 年上川島上沙勿略立下的決心，但對此前沙勿略對中國的關心、傳教的意圖未曾涉及。而弄清沙勿略作為未來展望所抱有的前往中國傳教之構想，應該有助於天主教遠東傳教的研究。

一、中國傳教思想的形成

歐洲中世紀（13-14 世紀）以方濟各會為中心開始向蒙古帝國傳播天主教，像馬可·波羅一樣往來於歐洲和亞洲的商人也置身其中。這些人撰寫的日記、見聞錄不斷向西方人描述東方的富饒，無疑對那些嚮往財富的西方人充滿了誘惑，對這些傳說中的財富蠢蠢欲動的人們開始投身與探索這些財富之中。眾所周知，其中馬可·波羅《東方見聞錄》對當時歐洲社會尤其具有很大的影響力。該書 1502 年在里斯本被翻譯成葡萄牙文，以“馬可·波羅書”⁽⁷²⁾一名出版發行，在西方世界中流傳甚廣。沙勿略在來印度之前便閱讀過這本當時流行很廣的書籍，從中多少瞭解了東方。當時在歐洲，來自亞洲的資訊為數還不多。

1542 年以後，沙勿略在印度半島傳教。那裡居住着中國人，往來中國的葡萄牙商人也不少，應該有獲得中國情報的機會。然據史料記載，沙勿略最初獲得的中國情報是在他 1545 年拜訪使徒托馬斯墓地時聽聞的。1546 年 5 月 10 日，他寫給歐洲耶穌會會士的信函中是這樣記述的：

很多人這麼傳說：使徒托馬斯去過中國，皈依了眾多天主教徒。天主教教會在葡萄牙人佔領印度之前，便派遣神父前往當地教育聖托馬斯和其弟子皈依的天主教信徒、實施洗禮等。我從這些神父中的一員馬爾·亞果布那裡聽說：葡萄牙人佔領印度，是他（亞果布）從故國到達印度之後的事情，而且，從已居住此地的神父處聽說過聖托馬斯去中國、皈依天主教徒的傳說。⁽⁷³⁾

後來的相關研究對沙勿略何時對中國傳教產生興趣沒有定論。然而從以上史實可以作出這樣的推測：赫赫有名的《馬可·波羅書》，尤其是後來聽聞的托馬斯傳教故事，讓沙勿略逐漸有了前往中國傳教的夢想。證據之一是人們從沙勿略逝世的隨身遺物中發現聖托馬斯的聖骨，僅此發現即足以說明托馬斯的影響與沙勿略傳教思想的形成不無關係。

二、在日本的親身體驗

沙勿略 1549 年 8 月至 1551 年 2 月在日本傳教，足跡遍及鹿兒島、平戶、京都、山口和豐後，兩年三個月的日本生活經歷，更加深了他對中國的認識，他來日本之前就對中國這塊神秘的土地有着極大的興趣。關於中國對日本社會的影響，沙勿略在 1552 年 1 月 29 日由交趾發給歐洲耶穌會士的信函中這樣記述道：

所有的人（日本人）聽說這件事（創造萬物的主的存在）都十分吃驚。因為他們崇拜的聖人教誨中沒有關於這個創造主的述說，故他們認為萬物之中不可能存在有唯一的創造主。而且，如果世界的萬物都有一個開始的話，那麼，作為日本人宗教信仰源頭的中國人應該知道吧？日本人確認中國人不僅知道來世，也通曉國家的統治。⁽⁷⁴⁾

日本社會把中國的文物作為一種權威，其國民導向基於對中國的崇拜。沙勿略親身感受，認識逐漸深化，這是他赴日後得到的最大收穫之一。臨行前，沙勿略從阿爾瓦雷斯和彌次郎提供的中國情報中，多少瞭解一些有關中國同日本間的關係，通過

兩年多日本實地生活，他真切地感受到中國這個文明古國對整個日本社會的巨大影響力非同一般。談及中國人的能力，沙勿略也有所體驗，在同一封信函中他如此稱曰：

根據迄今在日本和其它地方的所見所聞，中國人極具才華、聰明睿智，在日本人之上，且非常有教養。⁽⁷⁵⁾

比起以前獲得的“中國情報”，日本生活的經歷更讓沙勿略認識中國文化之偉大、中國社會之重要。深受儒學影響、漢唐遺風猶存的日本人曾質問他：

如果你們的宗教是真理，為甚麼作為一切智慧之源的中國人沒聽到它呢？⁽⁷⁶⁾

這個難以回答的問題使沙勿略萌發一個念頭：先以天主教歸化中國人，進而影響整個儒家文化圈，並斷言“若在中國天主教得以傳播，日本人則將對現在信仰的諸多宗教產生動搖”，中國人的皈依會從側面有力支持日本的傳教事業。

三、決意離日進入中國傳教

1551 年 11 月中旬，沙勿略離開豐後前往果阿。對此離日行為，他自己陳述理由大致有三：

要會面在印度的同事，以得到內心的平靜安閒；帶來合適日本的耶穌會傳教士；從印度帶來日本傳教中之若干不足的物質。⁽⁷⁷⁾

的確，沙勿略認為補充新的傳教團，以及必要的物質來日本是當時比較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12 月上旬，沙勿略乘坐的船停泊在中國上川島，在此地，遇上舊相識葡萄牙商人迪奧果·佩雷伊拉（Diogo Pereira），從佩雷伊拉處得知葡人被囚禁於中國內地一事，並讀到其中一囚犯伽斯帕爾·洛佩斯的獄中書信，洛佩斯等人是在中國沿海被官兵捕捉、投入監獄的。後來的研究認為，是洛佩斯的書信改變了沙勿略再次赴日的計劃，沙勿略信函中並

無對此事的記載。我們可以從當時正在馬六甲的耶穌會會士法蘭西斯克·佩雷斯 1555 年 1 月 21 日由交趾發往羅耀拉的信件中略知此事件的過程：

1551 年，（沙勿略）由日本歸來，經過中國各港口時，從被關押在中國的數名葡萄牙人的信函中瞭解到：若葡萄牙國王向廣東派遣使者、建立中葡間的友好往來關係，可以由此鋪平吾主耶穌·天主教之教法在中國傳播的道路，打開一條暢通的入口……（78）

被囚禁在中國的洛佩斯等人為自身得到求助，提出這個請葡萄牙國王向中國皇帝派遣使者的方案。然此時的沙勿略決定利用這個機會，希望得到許可：與派遣使者同行一方面解救葡萄牙人，同時展開天主教傳教工作。葡商佩雷伊拉亦十分讚成派遣使者及由沙勿略同行的主張，並出資援助，以保證順利進入中國的經費，沙勿略更堅定了前往中國的決心。

如前所述，沙勿略離開日本時，原本將重訪日本作為他的首要任務，但此計劃因故改為進入中國。他將日本開教取得的初期成果、尚未實施的京都傳教、日本視察等遺留工作全部託付給耶穌會同事。比起已經熟悉的日本，沙勿略更嚮往那個陌生、充滿神秘的中國，他開始邁出實施中國傳教計劃的第一步。首先，沙勿略向歐洲耶穌會士發去詳細的“中國情報”，主要有以下內容：

- 1) 中國國土位置處於日本的附近。
- 2) 日本人的各種宗派由此傳來。
- 3) 中國是個地大物博、平和祥寧的國度。
- 4) 據此地的葡萄牙人報告：中國人重視正義，比天主教教界的任何地方都適合正義之地。
- 5) 中國人比以往見到日本人、其他人更具有才華，聰明睿智，在日本人之上，非常有教養。
- 6) 中國物質極大豐富。大城市中居住很多居民，房屋由石塊建造，工藝精細。
- 7) 據所有人稱，該國的生絲產量非常豐富。
- 8) 該國信仰各種各樣宗教的人很多。

9) 1552 年我決意前往中國，因為那是一塊可能將我主耶穌信仰加以擴展的國土。

10) 如果中國人接受了天主教教義，日本也會由此對目前的諸種宗教產生動搖。

11) 從中國的主要城市寧波到日本的海路僅僅 80 海里。（79）

嘉靖三十一年（1552），這位享有宗教欽使特權的傳教士登上廣東沿海的一個名叫上川的小島。上川島在當時是葡萄牙商人對日貿易的中轉站。在葡商的幫助下，沙勿略在上川島建起了一座草棚教堂開始傳教，但他始終考慮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進入中國內地。這在他 1552 年 10-11 月份的幾封信中看得十分明白。跟隨沙勿略的華人修士安東尼奧·曼努埃爾·特謝拉也記錄了這一情況：

為前往中國，法蘭斯科神甫在滿刺加已費了不少力氣，他執意實施這一計劃。（……）在佛朗斯科神甫在那裡（上川島）逗留的全部



正在給羅馬寫信的沙勿略（16 世紀版） 里斯本圖書館

時間裡，他的一切心思在於如何進入中國弘揚耶穌基督的聖教。他與華商探討了許久。一些人說，他不可入華，因為中國國王不希望外國人進入他的國土，凡夾帶外人入華者嚴懲不怠。另外一些以為可以帶他去，看上去他像聖人。最後，人們還是認為無法帶他入華。但佛朗西斯科神甫決心非常堅決，他對我主滿懷希望，一定會入華。⁽⁸⁰⁾

最終，由於明政府海禁十分嚴密，沙勿略想盡各種辦法仍然無法進入中國內地而抱憾身亡。沙勿略雖然壯志未酬身先逝，但他的努力並沒白費，他生前寄往歐洲的信簡給予耶穌會極大影響，此後，耶穌會便開始將其“精神狩獵”的目標轉向“文明鼎盛”而又神秘莫測的中國。後來成功進入中國的利瑪竇這樣懷念他：

必定是沙勿略的在天之靈，乞求上帝把這個國土開放的！⁽⁸¹⁾

沙勿略的失敗指引了利瑪竇等耶穌會士的成功。1583年，意大利人傳教士羅明堅和利瑪竇先後來到中國，以商人的身份進入廣東肇慶，正式開始了他們的在華傳教活動⁽⁸²⁾，利瑪竇他們開始繼承沙勿略未竟的事業。

結 語

當天主教16世紀傳到日本時，日本島國已有從中國傳入的佛教、儒教，以及稱得上日本本土宗教的神道，應該說天主教在日本的扎根歷史尚很淺。但是，該宗教的傳教、教派勢力的發展並不畏懼於時間和根基上的弱勢，從未放棄過與其它宗教信仰的抗衡，試圖逐漸深入各階層和各民眾，給日本國的諸多信仰中注入由西方社會傳來的、全新的天主教精神。例如佛教，暫且不說佛教界把它作為維護日本國家的宗教，經常在“國家和執政者的保護之下隨心所欲地擴張自己的勢力，且成功地改頭換面

為民眾宗教”⁽⁸³⁾，而且佛教以天主教在日本傳教為藉口，展開與天主教的對峙以及宗教理論上的論爭。如五野井隆史所稱：

與天主教一方顯示出來的誠摯地研究佛教的態度相比，佛教並沒有認真地研究過天主教，反而，隨着德川幕府體制的確立，作為摧毀天主教的民眾機構發揮作用，寺院和民眾之間的紐帶以檀家制度為基本軸心更加強化。⁽⁸⁴⁾

隨着1549年西方傳教士沙勿略、托雷斯和費爾南德斯等人抵達日本鹿兒島傳教，作為異國一種神教的天主教進入日本後，一面受到佛教寺院、天皇、公家階層的反對和壓迫，一面卻在短時間內獲得眾多信徒、擴大勢力，其理由在於當時的日本人身處時代的大變遷過渡期的社會混亂之中，其思想和覺悟產生動搖迷惘，他們試圖尋求一種強勢的信仰來拯救自身。他們在期盼來世救助的同時，也渴望能夠在混亂狀態的社會中生存下去——即現世的拯救，強烈地希求得到現世的利益。⁽⁸⁵⁾這是天主教信仰得以在日本受落的一大要素。

【註】

- (1)(7)(8)(13)(14)(47)(57)(61)(62)(63)(64)(65)(66)岸野久著：《ザビエルと日本》，吉川弘文館，平成十年，頁2；頁90-91；頁97；頁24；頁31；頁32；頁33。
- (2)這是史上最早的一本傳記，儘管為16-17世紀出版的各種沙勿略傳記所利用，但其珍本一直蹤跡不明，1964年被發現。筆者在神戶女學院大學圖書館查閱到該傳記影印本。
- (3)圍繞將軍繼承權問題展開的將軍足利義政和其弟足利義視兩派的爭鬥，全國的武將權衡自己的利害關係，各自呼應，戰亂波及全國。這一年正是應仁元年（1467），史稱應仁之亂。——前掲海老澤有道著：《日本キリスト教史》頁6，日本基督教團出版局，1970年版。
- (4)“勘合貿易”——採用鄧鍾所撰寫《壽海重編》中的解釋是，勘合貿易（又稱朝貢貿易）是指海外諸國與明政府間進行的以朝貢為名的有限制的貿易。明政府明文規定：“貢船者，法所許，市舶之所司，乃貿易之公也；海商者，王法之所不許，市舶之所不經，乃貿易之所私也。”
- (5)現在山口市豎立有傳教紀念碑。
- (6)新村出著：《日本吉利支丹文化史》頁18，地人書館，1941年版。
- (7)G. Schurhammer S. J. et I. Wicki S. J., *Epistolae S. Francisci Xaverii aliaque eius scripta*, Tomus I (1535-1548), Roma, 1944, pp. 273-274.

- (10) (11) 1549年1月12日由交趾致羅耀拉的沙勿略函。G. Schurhammer S. J. et I. Wicki S. J., *Epistolae S. Francisci Xaverii aliaque eius scripta*, Tomus I (1535-1548), Roma, 1944, p. 10, p. 12.
- (12) G. Schurhammer S. J. et I. Wicki S. J., *Epistolae S. Francisci Xaverii aliaque eius scripta*, Tomus II (1549-1552), Roma, 1945, p. 10, p. 39.
- (15) (16) G. Schurhammer S. J. et I. Wicki S. J., *Epistolae S. Francisci Xaverii aliaque eius scripta*, Tomus I (1535-1548), Roma, 1944, p. 38; p. 39.
- (17) ARSI, Fondo Gesuitico 724, No. 4, f. 20.
- (18) 格奧爾克·舒馬赫爾編，金國平譯：〈方濟各·沙勿略通訊錄〉1549年11月5日函，譯文載金國平《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頁293，澳門基金會，2003年。
- (19) 威印平《日本早期耶穌會史研究》第一章頁32，商務印書館，2003年。
- (20) 陸若漢著，土井忠生等譯注：《日本教會史》下冊頁368，岩波書店，1978年。
- (21) 前掲《日本早期耶穌會史研究》第1章頁39-41。
- (22) Feitores e feitorias—Instrumentos do comércio internacional português no século XVI, *Brotéria LXXXI*, pp. 458-478.
- (23) 考慮上面的堺市商館的話題，此處“管理者”應指“商館館長”，因為沙勿略身為傳教士的緣故採用此說。
- (24) (25) G. Schurhammer S. J. et I. Wicki S. J. ed., *Epistolae S. Francisci Xaverii aliaque eius scripta*, Tomus II, p. 230; p. 223.
- (26) 前掲《日本早期耶穌會史研究》第2章頁60。
- (27) (30) 海老澤有道著：《日本キリスト教史》，日本基督教團出版局，1970年版，頁7；頁240。
- (28) 陸若漢著，土井忠生等譯注：《日本教會史》下冊頁295，《大航海時代從書》IX、X，第一期，岩波書店，1978年第3版。
- (29) 〈1548年1月20日沙勿略於科欽致羅耀耶穌會士的信簡〉，載《基督教書·排耶書》頁552。
- (31) 彌次郎後來受洗教名為保祿，成為日本最早天主教徒。
- (32) G. Schurhammer S. J. et I. Wicki S. J., *Epistolae S. Francisci Xaverii aliaque eius scripta*, Tomus I (1535-1548), Roma, 1944, p. 392.
- (33) 岸野久著：《西歐人の見た日本発見——ザビエル来日前 日本情報の研究》第二版，頁126-127，吉川弘文館，平成一年。
- (34) 島津貴久支援沙勿略神父傳教的目的是希望借助外力加強自身力量。他曾處心積慮阻止神父前往京都朝見天皇，目的就在於盡可能挽留他，並從傳教士身上得到所需的物品，以免他人捷足先登。——海老澤有道著：《日本キリスト教史》頁6，日本基督教團出版局，1970年版。
- (35) 島津貴久非常清楚傳教士所能帶給他的利益，也知道怎樣才能獲得這些利益。他從不隱瞞他的想法，至少已用行動提醒神父，招來葡萄牙商船不僅是他的真誠願望，而且也是神父用來換取傳教許可的籌碼。最後由於前往平戶的沙勿略神父並沒有為領主帶來他與葡萄牙商人的交易，致使島津貴久在希望破滅後立即翻臉。——前掲海老澤有道著：《日本キリスト教史》頁6。
- (36) (37) (39)(40)(41)(42)(43)(44) G. Schurhammer S. J. et I. Wicki S. J., *Epistolae S. Francisci Xaverii aliaque eius scripta*, Tomus II p. 200; p. 210-211; p. 211; p. 259; p. 228; p. 260; p. 201.
- (38) (45) 前掲陸若漢著，土井忠生等譯注：《日本教會史》上冊頁371；370-371。
- (46) 陸若漢著，土井忠生等譯注：《日本教會史》下冊頁291，《大航海時代從書》IX、X，第一期，岩波書店，1978年第3版。
- (48) (49) (52) 1578年10月16日白杵發出的弗洛伊斯信函，引自 G. Schurhammer S. J., *Franz Xaver-Sein Leben und seine Zeit-Zweiter Band: Asien 1541-1552 Dritter Teil Japan und China 1549-1552*, Freiburg, 1973, S. p. 266-268; p. 422.
- (50) 此家臣便是1551年隨沙勿略一起被派遣到葡印總督處的使節。
- (51) Jap. Sin., 8, 93v. Schurhammer, *Orientalia*, p. 533.
- (53) 前掲陸若漢著，土井忠生等譯注：《日本教會史》下冊頁584-585。
- (54) G. Schurhammer S. J. et Wicki S. J. ed., *Epistolae S. Francisci Xaverii aliaque eius scripta*, Tomus II (1549-1552), Roma, 1945, pp. 147-148.
- (55) (56) (58) (59) Biblioteca da Ajuda, *Jesuitas na Ásia* 49-IV-49, f. 62v; f.63; f.62v.
- (60) 海老澤有道著：《日本キリスト史》頁26，塙書房，1990年版。
- (67) G. Schurhammer et I. Wicki, *op. cit.*, Tomus I, p. 391.
- (68) Biblioteca da Ajuda, *Jesuitas na Ásia*, 49-IV-49, ff.63-63v.
- (69) 許明龍主編：《中西文化交流先驅》頁2，北京東方出版社，1993年12月。
- (70) 位於今台山市西南方的海域，是廣東省沿海最大的島嶼。
- (71) Georg Schurhammer S. J., *Der Ursprung des chinaplans des hl. Franz Xaver (Xaveriana, Bibliotheca Instituti Historici S. I. Vol. XII)* Roma, 1964, S.665-667.
- (72) 岸野久著：《西歐人の日本発見》頁126-127，吉川弘文館，平成一年。
- (73) G. Schurhammer S. J. et I. Wicki S. J. ed., *Epistolae S. Francisci Xaverii aliaque eius scripta*, Tomus I, Roma, 1944, p. 335.
- (74) (75) (76)(77)(79) G. Schurhammer S. J. et I. Wicki S. J. ed., *Epistolae S. Francisci Xaverii aliaque eius scripta*, Tomus II, Roma, 1945, p. 264; p. 277; pp. 273-274; p. 277.
- (78) I. Wicki S. J. ed., *Documenta Indica*, Vol. III, Roma, p. 247.
- (80) 前掲金國平譯《方濟各·沙勿略通訊錄》之《華人安東尼奧·曼努埃爾·特謝拉1557年9月4日的信》。
- (81) 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割記》頁139，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 (82) 前掲謝和耐（Gernet）著，耿昇譯：《中國與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碰撞》頁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 (83) (84) 前掲五野井隆史著：《日本キリスト教史》頁3；頁4。
- (85) 海老澤有道著：《日本キリスト史》頁16，塙書房，1990年版。